

发掘美好人性 彰显现代精神——论杜国威的话剧《人间有情》

胡德才

《城市文艺》第41期（2009年6月）

—

香港本土话剧创作和演出的兴盛始自1980年代中期。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成为香港本土戏剧创作勃兴的契机和背景，在那一时期，香港的前途和命运成为中英两国政府和香港人民关注的焦点，整个香港社会存在着一个强烈的自我认同的要求。正如戏剧家袁立勋所说：“面对‘九七’，香港人陷入对时代、对命运、对未来的沉思，寻找自己的身份。这样，就引发了香港本土剧创作的热潮。”〔①〕这股热潮虽已过去，但却由此揭开了香港戏剧发展的新篇章。在1980年代以来崛起的香港本土剧作家中，杜国威是最突出的一位。评论家方梓勋称：“他是香港剧坛第一个可以把编剧当作职业的人，标志着香港话剧的职业化日趋成熟。杜国威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香港剧作家。”〔②〕

杜国威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勤奋多产，创作舞台剧达30余部，各时期重要的代表作有《人间有情》（1986）、《聊斋新志》（1989）、《我和春天有个约会》（1992）、《南海十三郎》（1993）、《爱情观自在》（1995）、《Miss杜十娘》（1996）、《剑雪浮生》（1999）、《寒江钓雪》（2003）等，另有影视剧作30余部。杜国威的戏剧一方面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和民间文艺的土壤，注重展示和挖掘中华民族宝贵的传统美德，写人性的善良淳朴、人情的温馨美好，另一方面能以开放的姿态认同、借鉴和吸纳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西方现代戏剧的表现形式与手法，体现出鲜明的对现代性的追求。因此，他的戏剧既有偏重历史题材、带有怀旧倾向、抒写人间真情、发掘美好人性的基本视角和特色，但又能以鲜明的现代意识观照历史和人物，将现代戏剧的表现手法与

中国传统戏曲写意的美学思想和表现方法有机结合。作者成功地游走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浪漫抒情与客观写实之间，使其剧作既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散发出鲜明的现代气息，形成了典雅、温馨、活泼、清新的戏剧风格。他不仅是当代香港剧坛最重要的剧作家，也是中国当代剧坛少数几位戏剧大家之一。

三幕话剧《人间有情》是杜国威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第一部使他享有盛名的作品，正如他所说：“《人间有情》面世之后，人们就知道有一个叫杜国威的人存在。”他还提到，这部戏剧是他前期创作的“最高峰”〔③〕，同时，也是作者的戏剧中最为香港观众怀念的一部。该剧1986年11月由市政局香港话剧团首演，其后曾于1987年和1994年在香港、广州和新加坡等地重演，评论界称它是一部“值得同声一赞之作”〔④〕。作为杜国威戏剧创作道路上的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人间有情》自创作并首演至今，20多年过去了，它却并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减损其感人的艺术力量，原因何在？笔者试图对其艺术成就作初步探讨。

发掘美好人性的独特视角，取材历史的怀旧倾向，是《人间有情》的主要艺术特色，也是它能获得观众广泛共鸣并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的首要原因。

在人类文学艺术宝库中，有一类作品是以深刻描写人性著称的，政治、历史、现实都被淡化，或者成为隐隐约约的背景。这些伟大的作品，有的重在突出人性的丰富与复杂，如曹禺的《雷雨》、《原野》等戏剧；有的则意在表现人性的淳朴与美好，如沈从文的《边城》等湘西小说；还有的则是侧重刻画人性的扭曲与变异，如张爱玲的《金锁记》等沪港传奇。人性是多面的、丰富的、复杂的，这些伟大的作家与作品各以其独特的视角逼近了人性的本质，我们无须去区分高下，也不必拿同一把尺子去比短长，进而求全责备。

从描写人性的角度来说，杜国威应该是更接近写湘西小说的沈从文的。杜国威有一颗宝贵的童心，他“感性、热诚、易笑、好幻想”〔⑤〕，就像他笔下的人物，“带着阳光抱着爱”。他的戏剧写

的都是平凡的人，普通的事，但突显的是温馨的情，真挚的爱。从最初的《昨天孩子》讴歌一群沦落风尘的舞女的人性美与人情美，到《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抒写姚小蝶等四位歌坛姐妹的真诚友谊，突出“岁月变，情义在”的主题；从《虎度门》里粤剧名伶冷艳心的温柔多情与心灵美好到《剑雪浮生》中粤剧三巨头任白唐因缘际会相交相知抒写“剑雪浮生情永在”的传奇；从《梁祝》借民间传说重写“超脱生死的爱”到《寒江钓雪》通过粤剧泰斗薛觉先的情感世界“探讨‘爱’的精神”[⑥]，情、爱、义，这些具有普适意义和终极价值的温馨语汇构成了杜国威戏剧主题内容的关键词。杜国威当然不是对善恶美丑并存的社会现实没有基本的认识，但一个优秀的作家总会有他看取人生的独特角度和表现方式，沈从文认为：“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⑦]又说，“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来表现的。”（《废邮存底·给一个写诗的》）杜国威则说：“我总觉得写一些有希望和美好的东西，总比把生活里最痛苦的东西放上舞台为好。既然别人做的比自己做的好，那我就做自己能够做的东西好了，于是我便写了很多温情的东西。”[⑧]写人间温情，写人性美好，是杜国威的所长，是其戏剧的重要特色。《人间有情》中有一句台词：“天地有信，人间有情”[⑨]，这既是香港梁苏记遮厂（伞厂）几代经营者做人的写照，也是对杜国威戏剧的一个普遍主题的高度概括，从这个意义上讲，《人间有情》从标题到内容正是其戏剧的一个杰出的代表。

表面上看，《人间有情》写的是一个家族企业梁苏记遮厂百年的兴衰，作品从光绪 12 年梁苏在广州拾得一把洋遮并开始琢磨办遮厂写起，经过民国初年在广州的创业、抗战时期因战乱迁往澳门、1950 年代落居香港，到 1960 年代以后随着工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靠手工制作以信誉取胜的梁苏记遮厂已不适应人们观念的变迁和市场的竞争终于在 1980 年代宣布百年荣休。但梁苏记遮厂百年的盛衰只是戏剧的故事外壳，作者无意探寻百年遮厂兴衰的原因，也不追究遮厂与时代、社会的关系，因此百年遮厂没有像老舍笔下的

“裕泰大茶馆”那样成为社会的缩影。因为老舍写《茶馆》是着眼于时代、社会、政治，而杜国威写《人间有情》是面向人性、人情、人心。在《人间有情》里，战乱的发生、政局的变化、时代的变迁，可以影响遮厂的兴衰，但这不是作者要写的重点，对作者要表现的人及其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来讲，时代、历史、社会，包括遮厂兴衰都只是背景。这些背景在剧中也大多是由故事的叙述者简单介绍或一语带过。剧作对梁苏记遮厂的创业与经营也没有花费太多的笔墨，即或有用力表现的场景，用意也在于突显人性之醇厚、人心之善良、人情之美好。如梁苏记遮厂创办之初确立的“利人利己”的经营宗旨，可以那副对联来说明：“冇漏雨，保不脱色；正钢骨，永久包修”。遮厂经营百年，宗旨始终不变。还有抗战时期，遮厂拆迁澳门、香港两地，香港条件好于澳门，天赐、天佑兄弟却互相谦让；1960年代遮厂惨淡经营时期，天赐为侄女小玲前途考虑，安排她出国深造，可小玲为了能给伯父分忧，却坚持留守遮厂帮忙。冲突虽然一度激化，但双方都出自非常善良的愿望，表现的仍然是美好的人性。令人顿觉亲情洋溢，温馨无比。

因此，《人间有情》不过是以遮厂兴衰为线索来展示普通市民的悲欢离合，表现民间社会的人情美和人性美。遮厂创办人梁苏年轻时是广州一收买佬，以箍煲、补锅、收买破铜烂铁为业。一个偶然的机会拾得一把洋遮，进而琢磨其构造、研究其功能，开起了洋遮铺子。他为人善良、性情谦和，做生意以诚信为本。对子女一片慈爱之心，对工人体贴关心亲如家人。对子女婚姻他关心而不横加干涉，对晚辈追求婚恋自由和个人幸福而有违陈规的言行，他更多的是理解、宽容和赞许。在这里，没有旧式家长的专制蛮横，也没有工厂老板的贪婪刻薄。长子天赐淳朴厚道、敬老爱幼、和善待人。其耿直、仁厚的品行使才貌双全的陈家小姐对他一见钟情，因而拥有了美满的婚姻。后来，弟媳去世，他和陈盈将残废的弟弟接来家中细心护理，视侄女如同己出，照顾备至。总之，在杜国威创造的这个充满了“人情味”的世界里，父子、夫妻、兄弟、妯娌、叔侄、姑嫂、恋人、主仆、同事、朋友无不友善相待，以诚相

见，彼此设身处地、关心体贴，绝无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之事。在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里、在一个小型的家族企业里，洋溢着美好、温馨的人间亲情，充满了朴实而高贵的人性。

就像沈从文笔下充满健康、正直、美好人性的“边城世界”曾遭到质疑一样，也有人对杜国威在舞台上给我们留下的这样“一个温馨而重情义的地方”表示怀疑，因为，“离开剧场后我们仍得面对不美丽却真实的世界，信心在这里不能生根，诚意是奢侈品。”^{i[10]}其实，文学艺术对于我们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一是表现生活的丰富与复杂，帮助读者和观众更好地认识生活；二是揭示现实世界的丑恶与险恶，使人警醒并进而改造不美的世界；三是描绘理想人生应有的美好和温馨，以慰藉人们受伤的心灵、增进人们对生活的信心、净化人们被功利的社会污染了的灵魂、激发人们去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只要在某一方面实现了其目标，就完成了其使命。杨绛先生曾说：“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人间的光明。”^{ii[11]}《人间有情》就是一部带有一定的怀旧倾向，能给现代商业社会人们的心灵以慰藉和净化的优秀作品。在今天这个物质时代、功利社会，也许人情淡薄、竞争残酷，但正因如此，

《人间有情》所展示的一个诚信为本、淡泊名利、人性善良、温情脉脉的“人情味”极浓的世界才更显得可贵而令人怀念和向往。它能引领人心向善，带给人间的是温馨和光明。作者自述创作此剧的意图也是如此：“想借那个风风雨雨，内忧外患的时代，带出一些忧戚相关，悲欢离合小市民的生活琐事。透过他们的喜与哀，他们的抉择，他们的无奈，好让我们缅怀一下那早已匿迹在功利主义社会里的‘道’与‘情’，即使只是一瞬间，或者是几个零星片断……”。^{iii[12]}《人间有情》里的“怀旧”，既反映出社会转型时期香港人对历史的追忆和对自我身份的建构与认同，也表现了剧作家对日益功利化的社会现实的否定和对中华传统美德的留恋与向往。而这样一种既富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极富人情味的“怀旧倾向”，不仅与当代香港市民的心态与愿望相契合，也能获得所有现代社会广大民众的共鸣。

以现代意识观照历史和人物，创造性地运用史诗剧的叙事手法，形式活泼新颖，雅俗共赏，体现出鲜明的对现代性的追求，是《人间有情》的艺术成就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剧中的梁苏所具有的创业精神、经营理念、民主作风、宽容态度，尤其是对三个子女的婚事的处理，既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仁慈、和善、诚信等美好的一面，又符合现代社会民主、平等、自由等先进的理念。剧中最能突显作者的现代意识的是关于爱情的描写，尤其是对爱情故事中的女性的描写。天赐和陈盈的爱情故事本是按旧式的婚姻模式由家长决定起步的，但勇敢追求个人幸福的陈盈不愿接受家长制下的盲婚，她孤身前往遮铺考察未来夫婿，没想到诚实厚道的谦谦君子天赐在不自觉中却赢得了少女的芳心，陈盈满意而归却担心忠厚的天赐不及时采取行动，又主动以诗传情：

“知否闺中常盼望，莫因风雨误佳期。”未来公公梁苏因此“击节赞赏，惊为天人。”这样精彩的情节既非常富于戏剧性，令人回味无穷，又成功地刻画了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天赐的憨厚、耿直，陈盈的大胆、聪慧，梁苏的和善、宽厚，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尤其是陈盈大胆追求个人幸福的行为体现出鲜明的现代精神。因此，她主动只身“相亲”的情节因饱蕴着现代意识和浓郁的喜剧色彩而成为了剧中最精彩的片断，也将成为戏剧艺术中的经典情节。此外，天佑与秀玲的外乡奇遇并私定终生、美娇与白英之间英雄美人的爱情传奇、阿贵对美娇爱的执着也都既古老又新鲜，特别是爱情传奇中的女主角既不乏传统东方女性的内秀与美德，又以其独立的意志和过人的胆识而彰显出现代风采。

《人间有情》戏剧故事的时间长达百年，因而在形式上恰当地借鉴了布莱希特史诗剧的叙述手法，剧作以戏剧性场面表现的只是百年历史中特别能展示民间人情美和人性美的日常生活片断，更多的历史事件、遮厂兴衰的过程以及梁氏家族的诸多人生变故都是通过叙述人梁苏记遮厂第三代传人梁昌华叙述出来的。叙述人既是剧中人，又是剧中唯一和读者直接沟通和交流的人物。独特的叙述形式，使剧情繁简得当，重点展示的戏剧性场面艺术感染力强，而历

史过程的叙述又使剧情连贯、背景清晰。而叙述人与观众的沟通又产生了“间离”效果，启发了观众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形式活泼新颖，雅俗共赏，正是杜国威戏剧受到观众普遍赞誉的一个重要原因。

iv[①] 方梓勋编着：《香港话剧访谈录》第 105 页，香港戏剧工程 2000 年 3 月版。

v[②] 方梓勋：《近二十年香港话剧的发展（1977-1997）》，《戏剧》1999 年第 1 期。

vi[③] 方梓勋编着：《香港话剧访谈录》第 127 页，第 129 页，香港戏剧工程 2000 年 3 月版。

vii[④] 罗雪韞：《“徇众要求”的佳作》，《大公报》1987 年 11 月 15 日。

viii[⑤] 杜国威：《他比我强得多，叻得多》，《天长地久》第 1 页，文林社出版有限公司 1999 年 1 月版。

ix[⑥] 杜国威：《编剧的话》，《寒江钓雪》第 2 页，次文化有限公司 2003 年 11 月版。

x[⑦] 沈从文：《给志在写作者》，《大公报·文艺》1936 年 3 月 29 日。

xi[⑧] 方梓勋编着：《香港话剧访谈录》第 129 页，香港戏剧工程 2000 年 3 月版。

xii[⑨] 杜国威：《人间有情》第 138 页，次文化有限公司 1995 年 9 月版。

i[⑩] 奕己：《人间正道是沧桑》，《信报》1987 年 12 月 2 日。

ii[11] 《杨绛的答辞》，《中国翻译》1986 年第 6 期。

iii[12] 杜国威：《编剧的话》，《人间有情》第 1 页，次文化有限公司 1995 年 9 月版。

原载香港《城市文艺》第 41 期（2009 年 6 月）

厦门大学图书馆